

推動兩岸關係發展 香港角色日益吃重

| | |
|---|---|
| <div><div><div><div></div><div>議論風生</div></div><div><div></div><div>李伯達</div></div></div></div> | <p>台灣地區高雄市長韓國瑜三月訪港，其間拜會中聯辦主任王志民，被綠營攻擊為「一國兩制」背書，三名香港反對派立法會議員甚至發表聯署聲明，批評韓國瑜到訪中聯辦並不合適，「對香港市民發出錯誤的信息」云云。</p> <p>面對綠營「抹紅」，韓國瑜毫不畏懼。二十天之後，台灣親民黨主席宋楚瑜又率團展開粵港澳大灣區之旅，首站是香港，又走進了中聯辦大樓，獲得中聯辦主任王志民會見。王志民主任明確指出：「處理有關涉台事務是香港中聯辦的五項職能之一，我們歡迎台灣朋友到訪中聯辦，並熱忱為廣大台胞服務」。</p> <p>王主任理直氣壯表明，中聯辦有權有責處理涉台事務。如果說中聯辦過去處理涉台事務傾向處於幕後，隨着形勢發展，今後不排除有更多變化。「歡迎台灣朋友到訪」一說，也顯示今後島內認同「九二共識」的政治人物訪港，「走進西環」將成為常態。</p> <p>外界一直有個誤區，就是《基本法》列明中央政府除負責香港國防、外交事務之外，其他均屬特區政府高度自治範圍之內。這其實是重大謬誤！因為中央根本不存在「剩餘權力」，高度自治權的限度在於中央授予多少權力，特區就享有多少權力。</p> <p>一九九五年，時任國務院副總理錢其琛發表的有關《香港涉台問題基本原則與政策》（「錢七條」），實際上填補了《基本法》相關空白。「錢七條」明確規定，九七年之後的港台關係是「兩岸關係的特殊組成部分」，涉台問題中涉及國家主權和兩岸關係的事務，須由中央人民政府安排處理，或在中央人民政府的指導下由特區政府處理。</p> <p>換言之，特區政府並沒有獨立處理涉台事務的權力，實際上也沒有專門的機構處理（目前由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兼管），「涉及國家主權和兩岸關係」方面權在中央。中央政府專門處理涉台事務的是國台辦，中聯辦全稱是中央人民政府駐香港特別行政區聯絡辦公室，職能包括處理有關涉台事務。具體負責的中聯辦台灣事務部，部長通常來自國台辦，高度掌握中央對台方針、政策。</p> <p>事實上，過去台灣政治人物訪港，中聯辦都有參與。民進黨前主席謝長廷2013年以智庫董事長身份到訪香港，就是由時任中聯辦台灣事務部長唐怡源接機。謝長廷與中國社科院台灣研究所在港舉行研討會，也是由中聯辦協調，這一切他本人和民進黨都心知肚明，只是換了韓國瑜與中聯辦接觸，他們就持雙重標準，暴跳如雷。</p> <p>反對派幾個議員發表聯署聲明，批評韓國瑜到訪中聯辦並不合適，「對香港市民發出錯誤的信息」，同樣是不倫不類。中聯辦處理涉台事務是職責所在，釋放什麼「錯誤信息」？至於聲稱「中聯辦無權代表香港」，更是讓人笑掉大牙。</p> <p>今年一月國家主席習近平發表對台講話，提出探索「一國兩制」的「台灣方案」。作為最早實踐「一國兩制」的香港，在兩岸關係將扮演更獨特和重要的角色。中聯辦堂堂正正打開大門歡迎台灣朋友到訪，也是應有之義。</p> |
| <div><div><div><div></div><div>香港政情</div></div><div><div></div><div>文兆基</div></div></div></div> | <p>前政務司司長陳方安生早前連同反對派立法會議員郭榮鏗及莫乃光，接受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邀請訪美。他們「告洋狀」的舉動，自然惹來社會各界口誅筆伐。但是從法理上而言，三人勾結外國勢力，又是否違反《基本法》，或者是觸犯現行的本地法例呢？這似乎是更值得我們探討的問題。</p> <p>有意見認為，《基本法》第23條規定特區政府應自行立法，禁止任何危害國家安全的行為，當中便包括「與外國的政治性組織或團體建立聯繫」，所以三人今次訪美「告洋狀」，已是抵觸《基本法》第23條的規定，只是特區政府至今仍未完成23條立法，使香港存在法律缺口，無法把他們依法懲處。</p> <p>可是，根據當年的《國家安全（立法條文）條例草案》，只是「禁止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政治性組織或團體與外國的政治性組織或團體建立聯繫」，而沒有禁止個人勾結外國政治勢力的行為。在此情況下，三人今次訪美「告洋狀」是個人行為，還是組織行為，似乎才是他們有否違反《基本法》第23條的關鍵。若他們的行動只被視作個人行為的話，即使特區政府當年已完成23條立法，似乎也是奈何不了他們。</p> <p>是故，今次三人到美國「告洋狀」，確實反映出現時的法律漏洞，但其漏洞跟23條尚未完成立法並無直接關係。當然，《基本法》沒明文禁止，不代表特區政府不能透過本地立法禁止，因為《基本法》賦予了立法會制定本地法律的權力。若是個別政客「告洋狀」的行為，損害到國家和本港的安全及利益，特區政府在未來制定國安法時，也應考慮立法禁止。</p> <p>另有一點必須注意，特區政府雖未完成23條立法，但《社團條例》在回歸之後，也曾作出修訂，某程度上滿足了23條的自行立法規定。根據《社團條例》第8（1）（b）條，如有「社團或該分支機構是政治性團體，並與外國政治性組織或台灣政治性組織有聯繫，社團事務主任可建議保安局局長作出命令，禁止該社團或該分支機構運作或繼續運作」，即是保安局可取締勾結外國勢力的組織，跟取締「香港民族黨」一樣。</p> <p>可是，《社團條例》對於「聯繫」的定義，只包括：（a）直接或間接尋求或接受外國或台灣政治組織的資助、任何形式的財政上的贊助或支援或貸款；（b）直接或間接附屬於外國或台灣政治組織；（c）任何政策是直接或間接由外國政治性組織或台灣政治性組織釐定；（d）其決策過程，受到外國或台灣政治組織直接或間接作出指示、主使、控制或參與。換句話說，今次三人到美國「告洋狀」，不算現行法律定義下的「聯繫」。</p> <p>問題是，有人接觸外國的政府、官員或議員，並游說對方做出損害國家和本港利益之事項，為何又不被視作「與外國的政治性組織或團體建立聯繫」呢？「聯繫」在現行法律定義下的定義，是否過於狹窄呢？這樣的法律定義，又是否體現《基本法》第23條的立法原意呢？這也是23條未來立法的時候，特區政府甚至中央應該思考的法律問題。</p> <p>時事評論員</p> |

反對修訂《逃犯條例》是自製恐懼

| | |
|--|---|
| <div><div><div><div></div><div>焦點熱議</div></div><div><div></div><div>葉劉淑儀</div></div></div></div> | <p>去年發生的港男台灣殺人案，因為香港及台灣之間沒有移交逃犯協議，未能把疑犯移送台灣受審，觸發保安局提出修訂《逃犯條例》和《刑事事宜相互法律協助條例》，建議「一次性個案移交」可適用於「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任何其他部分」，即包括內地、澳門、台灣。</p> <p>香港法例503章《逃犯條例》是回歸前訂定的法例，作為前保安局局长，我於1998年張子強案後開始就修改條例及達成內地與香港安排和中央政府磋商，惟因為兩地法制差異，始終未能達成協議。二十一年後的今天，若能成功修例，堵塞漏洞，我當然歡迎。</p> <p>反對者自製恐懼</p> <p>不過，由於修例建議涉及中國內地，而內地的法治水平與香港有差距，引來回響在所難免，例如法律界選委發表聲明促請保安局撤回修訂條例草案（《星島日報》4月9日），「泛民」散播恐懼也屬意料之內。只是想不到商界的反對聲音最大，他們要求不設「追溯期」或為「追溯期」劃線，也有要求撤回草案，甚至有富商急不及待入稟高院申請司法覆核，相信政府也始料不及。</p> <p>商界反對聲音強烈，我認為是自製恐懼，主要源於他們擔心自己會被移交。例如有富商因擔心修例後會被移交而申請司法覆核，社會人士要看清事實。個別人士因為之前已經被定罪，而新法例生效後有可能會遭移交，這純粹是個別情況，我不認為政府是為了個別被定罪人士而提出修例，這次修例目的是填補法網漏洞，避免香港成為「逃犯天堂」；如果是為了個別直接受影響人士而修例，那根本是違反條例草案的宗旨。</p> <p>此外，早前全國政協委員、公安部前副部長陳智敏表示，從內地逃到香港的重犯有三百多人，全部「有名有姓」（《星島日報》3月13日），相信也挑動了商界的神經，擔心自己「榜上有名」。</p> <p>例如代表中小企的「香港各界商會聯席會議」</p> <p>中聯辦主任王志民日前在「全民國家安全教育日」香港研討會上發表了《太平山下如何共享「太平」》的講話，對過制香港的分裂活動、維護國家安全、維護香港法治和秩序，有重要的意義。</p> <p>王志民主任指出，非法「佔中」過去5年了，它警醒我們，要正視並解決香港在維護國家安全法律制度方面存在的「突出短板」和「風險點」，這是實踐「一國兩制」、維護繁榮穩定的保障，也是堅守法治核心價值、維護國家安全的要義。</p> <p>「佔中」從犯須受法律制裁</p> <p>要解決「佔中」的這個大是大非問題，第一要正確對待法庭的判決，第二要形成主流的輿論，指責煽動佔領者是罪人，使得大家從思想上認識到「佔中」違反基本法，違反香港法律與秩序，大家都不支持這種顛覆性的活動，香港同胞才可以在太平山下共享「太平」。如果仍然有一大批的青年人受到蠱惑，弄不清楚是非曲直，那麼香港仍然有隱患，隨時出現動亂。</p> <p>香港的不少傳媒，特別是電子傳媒，在報道審訊「佔中9人」新聞的時候，強調了「公民抗命」，還重點地報道了「佔中」搞手「求情」大量的言論，宣傳自己的正義和英雄本色。這種報道，並沒有否定「佔中」，而且是在宣傳所謂的「公民抗命」。謬論流傳，這使得港人仍存在許多模糊不清的思想，後患非常深遠。</p> <p>出現這種情況其主要原因是法官在判詞中提到，「佔中」三人在2013年3月發起「讓愛與和平佔領中環行動」，法庭明白「公民抗命」在香港獲得肯定，但同時指出「公民抗命」絕非刑事控罪的辯護理由。這句話有兩重意思，第一，「公民抗命」在香港獲得肯定；第二，「公民抗命」絕非刑事控</p> |
|--|---|

| | |
|---|--|
| <div><div><div><div></div><div>焦點熱議</div></div><div><div></div><div>陳光南</div></div></div></div> | <p>秘書長沈運龍先生日前表示，當年港商北上設廠常遇到內地官員索取紅包，很多中小企擔心修例後會遭追究（《蘋果日報》4月15日）。我認為是過慮。</p> <p>我要指出一點，若有港人觸犯了內地法律，只要踏足內地便有可能遭檢控，根本不用根據《逃犯條例》也可將其逮捕，議員們平日也會收到港人於內地犯事遭拘禁的求助個案。而是次修例針對的，是在犯法後不再踏足台澳內地的人士，即是真正在逃的逃犯，不是日常穿梭內地、香港、台灣和澳門的商人。而且要啓動移交申請，香港法庭程序相當繁複、費時，及費用不菲，請求方要負責所有法律訴訟費用，像「多年前給過紅包」這類事件並不是是次修例的目標。</p> <p>在反對者不斷炒作下，不單商界擔憂，有市民誤以為為在內地有租務糾紛、民事糾紛也會遭移交，顯示政府解釋不足，市民未能充分掌握條例細節，以致以訛傳訛、自製恐懼。</p> <p>其實條例對涉嫌人士的人權保障十分充足，一旦啓動移交申請，涉嫌人士便可向法院申請人身保護令，若法庭批准移交，涉嫌人士亦可申請司法覆核。因此，港商也好，外商也罷，實在無需過慮，嚇己嚇人。</p> <p>不設「追溯期」等於特赦</p> <p>有議員提出修訂最好沒追溯力，或者把「追溯期」劃定指定年期內，我認為並不可行。律政司司長鄭若鵬也表明難以為修例「追溯期」劃線或不設「追溯期」，「因為一個逃犯當然是涉嫌犯了一些罪，才需要引用這個條例。」（《星島日報》4月9日）首先，《逃犯條例》涉及的就是犯了案而仍然</p> <p>罪</p> <p>的辯護理由，所以，煽惑公眾援罪成立。如此一來，公眾認可的行動變成了法庭不認可。</p> <p>事實並非如此，八成的民意都不認可假藉「公民抗命」名義破壞公安秩序。法庭的審判過程中，接納了「佔中」搞手的證人供詞，三人引用中大新聞與傳播學院院長李立峯的民意調查作辯解，稱逾8成受訪者指「為保障香港的自由」和「爭取無篩選的普選」是參加佔領的非常重要原因；只有6.5%人報稱「響應及支持佔中三子」是非常重要原因，試圖藉此證明三人縱使煽惑亦不能造成妨擾。法官批准傳召李立峯以專家身份作供解釋其研究，是首宗刑事案接納民意調查證供。</p> <p>結果，法官在判詞中寫出了「『公民抗命』在香港獲得肯定」的觀點，這完全是廣大群眾不接納的。這種不分是非的說法，擾亂了社會的是非的觀念，亦完全不利於通過判決防止動亂再度發生。留下了不少思想的混亂和後遺症。</p> <p>是次判決雖然釐清了很多準則，也引申出了法律的準則的混亂。法律面前人人平等，這一個審訊完畢後，立即傳出因為「佔中」被拘捕的1050人，將不會被起訴的說法。衆所周知，現在被控的九名搞手，並不是最主要的組織者。更重要的主謀是勾結境外的政治勢力，並且提供了大量的金錢支援，在幕後策動了這場動亂的人物。</p> <p>這個案件的判罪理由很奇怪，如果有關人等沒有在動亂的現場出現，或者沒有在現場進行煽動並立即引起了暴力衝突，就可以判處無罪。這種判處的邏輯明顯違反了刑事法律的要素和原則。任何人參與了犯罪活動事先提供了財政、情報信息、行動</p> |
|---|--|

| | |
|--|---|
| <div><div><div><div></div><div>焦點熱議</div></div><div><div></div><div>葉劉淑儀</div></div></div></div> | <p>在逃的人，犯了案固然是過去式的，若條例沒有「追溯期」，即是處理不到已發生的案件，即是等於特赦罪犯，原則上不妥當。即使為「追溯期」劃線也不妥，我們要以什麼準則把「線」劃在哪一年？兩年？四年？無論如何也會引起爭議，徒添更多紛爭。</p> <p>為了數票遷就商界？</p> <p>大抵為了釋除商界疑慮、爭取支持，政府提出剔除九項經濟罪類，涵蓋電腦、關稅、破產、公司、證券、知識產權、貨物進出口、環境污染、虛假商品說明等移交罪行。</p> <p>我要指出，上述九項罪類，不少相當嚴重，例如電腦犯罪、瞞稅，不能因為是「白領罪行」便淡化罪行的嚴重性；又例如環境污染，若有化工廠污染河流，或有食品廠藥物廠生產對人體有害的食品藥品（例如毒奶粉），禍害可以相當之大，也可造成嚴重傷亡，屬嚴重罪行，我看不到任何理由因為涉及商界便要把相關罪行「抽起」，原則上有違公義。</p> <p>早前，有近百名的士司機示威，抗議政府縱容「白牌車」不合法載客取酬，要求政府採取措施打擊「白牌車」（《東方日報》1月15日）；也有的士團體向海關舉報網約車平台Uber個案，指其涉嫌經營白牌車，但司機並沒有出租汽車許可證（《東方日報》3月4日）。</p> <p>我想指出的是，若政府嚴厲取締白牌車司機，卻輕易遷就商界，是不是雙重標準？若政府純粹因為要數票而遷就商界，情況更是極不理想，不符公義。</p> <p>最後一提，其實西方國家經常提醒香港，不可以成為洗黑錢天堂、逃稅天堂，經常要求香港加強監管，那為什麼否決《逃犯條例》修例，讓香港成為「逃犯天堂」，反而會有利營商？所以，若有聲音指香港通過《逃犯條例》修訂便是打擊香港營商環境、外資會撤走云云，實屬荒謬及誤導。</p> <p>立法會議員、新民黨主席</p> <p>計劃、訓練工作、並且通過文字和口頭的形式，教唆和協助他人犯罪，他都構成了合謀和教唆的罪名。如果是事發時因為不在現場，立即可以逍遙法外，那麼許多刑事案件就不可能懲罰主謀了。</p> <p>幕後主謀仍逍遙法外</p> <p>長達七十九天的動亂，其中暴力的和違法的場次很多，犯罪者的輕重有別，大量的香港市民的財產和人權自由受到損失和傷害。絕對不能只以9人「祭旗」了事，其他的煽動者都網開一面。這個案件有三個主要被告人因為不在現場而有一項至兩項罪名不成立，但他們在事件發生前都作出組織和煽動行為，參加了會議和培訓工作，有許多重要的刑事案件，主要的被告人並不一定在現場，也一樣入罪。許多謀殺案件，主謀都是在幕後策劃，提供犯罪的信息，提供金錢組織犯罪行動，雖案件發生的時候不在現場，他們一樣被判處謀殺罪名成立。許多大型的電話和網上欺騙案件，主謀和協同的犯罪者都不再現場作案，一樣可以判處欺騙或勒索罪名成立。因此，以有沒有在動亂的現場進行煽動作為判罪的依據，是違反刑事法律的判例和基本原則的，律政司應該研究有關判決進行上訴。</p> <p>最明顯的是，戴耀廷在2013年1月16日信報刊出《公民抗命的最大殺傷力武器》的文章，接着組織了多場有關「公民抗命」的會議，制定了政策，組織了所謂「死士」，並且與境外勢力勾結。但是根據法官的裁決，在2014年9月28日戴耀廷在政府總部東翼地宣布「佔中」提早啓動前的所有行為，都不算犯煽惑擾亂罪。這樣就把犯罪的時間和空間大大收縮了，使更多的重要犯罪者離開在法網之外了，也為不起訴更重要的人物，埋下了伏筆。這正是一個風險點。</p> <p>資深評論員</p> <p>」，不如說它是一場由英美等外國勢力在背後煽風點火的「港版顏色革命」，是一場無法無天的大動亂。「佔中」帶來的後遺症包括摧毀法治、引發旺角暴亂、「港獨」蔓延，其衝擊和影響遠比反英抗暴大何止十倍八倍。</p> <p>「佔中」不但衝擊特區政府管治，更衝擊國家安全。直到今日，「港獨」勢力依然猖獗。那些已被判罪成「佔中」發起人和參與者，以及其中39名主事者仍逍遙法外，若按港英當局的管治權威，他們早已被判入獄，甚至遞解出境，罪名是危害政府的管治地區、嚴重破壞社會治安和秩序。</p> <p>反觀特區政府，對起訴「佔中」違法者遲遲不敢大動手腳。過去多年被起訴的只是一些微不足道的蝦兵蟹將，至於那些「佔中」主事者至今仍不敢採取法律行動，究竟為何如此？是證據不足或是調查需時，時隔已經五年了，還等什麼？這39名主事者一日不起訴，全港市民都有一種說不出的心結和抑鬱。對於「佔中9人」被判罪成，市民也毋須過早開心，還要看本月24日法官的判刑，才知曉究竟是市民勝利了，還是「佔中」分子笑到最後。</p> <p>香港華人革新協會副會長</p> |
|--|---|